

必须重视唯物史观的 ☆ 学习和研究 ☆

吴 黎 平

四十多年前，艾思奇同志和我合写过《唯物史观》一书，现在当同志们劝我将此书修改重版时，我不禁想起了写作此书过程的历史情景。当时，从全国各地涌向延安学习参加抗日的情况，和目前广大青年投入新的长征的情况，颇有一些相似。我们的广大青年如果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作指导，他们就会发挥出更加巨大的物质力量，不仅“四化”可以早一点实现，而且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也可以接近一步。现在，艾思奇同志这位卓越的哲学家已经逝世十六年，不能再和我一起来修改本书，但我一人也要竭尽全力，来努力完成这一任务。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的炮声，开始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当时革命圣地延安军民以高度的热情迎接全国各地涌来学习的青年。他们远道跋涉，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来接受延安的革命教育。那时延安办有抗大、陕北公学、马列主义学院和中央党校等，青年们迫切求知之心是令人十分振奋的，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等在百忙中亲自到学校讲课。但是，当时知识青年和现在我国广大知识青年有一点相似之处，就是他们没有受过系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教育，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抗战主张有哪些区别，共产党的抗战为什么这样坚决，共产党人的意志和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前途又将如何，凡此种种，他们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毛主席看到了当时广大知识青年的这个弱点，指出解决这一问题对于抗战和我党事业是极其重要的，提出大家都来做青年的

思想工作，不仅要教育青年理解党的坚决抗战的方针、政策和任务，而且要他们树立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广大青年的思想觉悟，成为自觉的革命者，不仅能去奋勇地夺取抗战的胜利，而且还能进一步努力去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历史的进程，正是像毛主席所预见的那样发展，广大知识青年走上了党所指引的革命道路。历史事实证明，解决知识青年世界观和人生观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党中央提出了“四化”的宏伟目标，全国广大青年投入到新的长征，满腔热情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战斗着。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但是，由于“十年动乱”的破坏和影响，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大多数没有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他们虽然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但还没有树立起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因此，在旧的社会习惯势力包围下，有的人经不起资本主义的和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袭击，什么“向钱看”、什么“人都是自私的”等等乌七八糟的东西，都被当做新的东西来追求。他们不知道这些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早已批判过的资产阶级赤裸裸的“现金交易”一类的东西。他们有些人迷失了方向，甚至毁坏了自己，造成了党和人民的损失。因此又一次证明了当年毛主席提出大家都来作青年思想工作的无比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当时，毛主席正是抓住了思想工作这个关键，他自己带头，钻研马列主义哲学，写出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光辉著作。当他得知艾思奇同志已经来到延安，就高兴地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他亲自把《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油印本签送给艾思奇和有关同志，希望大家提出修改意见。在毛主席的创导下，延安成立了新哲学会，毛主席自己也参加这个学会，并请艾思奇等同志承担了这个学会的领导工作。毛主席十分关心学会的工作，经常参加讨论和研究哲学问题。我同艾思奇同志是在他 1937 年来到中宣部工作时认识的，当时他搞文联工作，我编《解放》周刊，并且都在马列主义学院讲课，他讲哲学，我讲马列主义。当时毛主席也亲自到马列主义学院讲课，《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刘少奇同志的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是在马列学院讲的。张闻天同志主要讲中国革命问题。当时确定把研究哲学，解决青年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问题，当作思想工作的一环。

回想当时的延安，抗战工作是十分紧张的，生活又很困难，但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大家情绪都非常高涨，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的哲学。在这样的情况下，毛主席要艾思奇同我到那里去，说广大知识分子当前迫切问题是要解决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问题，办法就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教育。而当时没有合适的书，毛主席要我们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在最短期间编出一本书。在毛主席的亲自指导下，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来编写。在三十年代，我曾编写过一本《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书，艾思奇同志以前曾写过《大众哲学》一书，我们在这些书的基础上参考其他资料，共同商定一个提纲，然后分头编写，互相补充修改。张闻天同志当时兼中宣部部长，我们在写作过程中，经常和他商量。经过大家共同努力，不到半年时间，就把这本书写成了。最后，请毛主席审查。他很忙，没有时间，他看了看以后说，就拿去印吧！可是当时延安的印刷厂刚开办，比今天的条件差远了，但大家对印此书非常努力，1939年3月这本书就印出来了。随后各根据地都普遍翻印，作为干部的一个学习资料，后来在上海也出版了，那里把书名改为《科学历史观教程》，以适应当时大后方的环境。这本书，虽然份量不大，质量也不够理想，但却是适应当时革命青年学习的迫切需要，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直接关怀下写成的，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

现在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很需要用唯物史观来武装青年的思想。我们以前那本书的内容，是根据唯物史观的体系和当时的革命需要来确定的，当时曾要求密切联系实际，通俗易懂，使人看起来有点兴趣，愿意读下去。为了适合我国青年的需要，我们不仅增加了“民族与民族斗争”一章，而且大量用了抗日的例子。全书编定以后，原本没有“家族”一章，艾思奇同志建议，是不是应当把家族问题作为单独一章增写进去。他很快就完成了这一章的补写工作。这样，这本书就增加了两章新的内容，颇和以前讲唯物史观有所不同。恩格斯曾说过唯物史观所讲的

“生产本身又有两种”，即一方面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也就是家庭。书中讲了家庭的产生和发展，又介绍了列宁对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中发生的所谓“杯水主义”的批判。这对今天人们正确对待恋爱、婚姻和家庭的问题，仍有现实意义。生活之树是常青的，在这棵树上开出来的唯物史观之花，也应当是常青的。

回顾当年毛主席和党中央如此关心青年的思想工作，广大革命青年也如此热心地追求真理的情景，想想今天有些青年对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却不很关心，甚至认为自己看透了马列主义，发生了所谓“信仰危机”的情况实在令人担心。这不禁使我想起恩格斯当年对某些自然科学家否定哲学作用的忠告。他说：“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只有忽视哲学或侮辱哲学，才能从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因为他们离开了思维便不能前进一步，而且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范畴，而这些范畴是他们盲目地从那些被早已过时的哲学的残余所统治着的所谓有教养者的一般意识中取来的，或是从大学必修课中所听到的一点儿哲学（这种哲学不仅是片断的东西，而且还是属于各种不同的和多半是最坏的学派的人们的观点的混合物）中取来的，或是从无批判地和杂乱地读到的各种各样的哲学著作中取来的，所以他们完全作了哲学的奴隶，遗憾的是大多数都作了最坏的哲学的奴隶，而那些侮辱哲学最厉害的恰好是最坏哲学的最坏、最庸俗的残余的奴隶”。^①自然科学家尚且如此，何况一般青年！要想摆脱哲学，不受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支配，除非不在现实社会中生活。因为人的生活和其他动物不同，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一定的思想支配。而他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头脑里固有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像小孩学会走路和说话一样，从吃奶时候开始，就一点一点地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否则，他既不会两脚走路，也不会说话，当然也不会思想。思想总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如果青年也有什么狂想的话，那么，他也只有在一定思想材料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因为他的头脑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3页。

里如果一个概念也没有，他就根本无法进行思想。“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①。因此不关心哲学，不关心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自暴自弃的表现，甚至自己已经受了坏哲学的支配，走上了错路，还以为自己有什么新发现，走了什么正道，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呀！

因此，我们希望我国广大青年能象抗战时代的延安和各根据地的革命青年一样，踊跃地学习和研究唯物史观。列宁说过：“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别名”，“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②。这是无数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的客观真理，也是我所知道的许许多多先进思想家革命家所提倡的唯一正确的思想。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3页。

②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10页。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三题

吴 江

题 解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一般叫做唯物主义历史观，我在《历史辩证法》一文中曾把它称做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多了“辩证”二字，并认为历史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是一个东西。这件事颇受人讥嘲。有人责问道：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难道还有什么机械唯物主义历史观吗？难道能够用历史辩证法来取代历史唯物论吗？但我并不想改变原来的提法。我以为，有些事物或概念，在原则、内容、含义一致的前提下，叫法尽可以不同。例如，一张长形的凳子，乡下人叫长凳，城里人叫条凳，都是可以的，不一定非叫长凳不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一般叫唯物主义历史观，有时叫它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我以为也是可以的，不必一见“辩证”二字就浑身不舒服。其实，稍有思考能力的人都可以看出来，这里不只是一个叫法的问题。我的意思其实简单得很，无非是想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它的自然观是辩证的、唯物的，它的历史观也是辩证的、唯物的。所以我这篇文章的题目还是叫做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文中则有时称唯物主义历史观，有时称唯物史观，有时称历史唯物论，以示不管怎么叫法，都是一回事。至于究竟有没有机械唯物主义历史观（有人故意把它生造成所谓“机械历史唯物论”）这东西，据我所知，好象是有的，那就是旧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恩格斯说：“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就是说，机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机械历史唯物论”是唯心史观，它并不因为和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相对称而变成唯物史观（或唯物史观的一种）。这是题外话，不多说了。下面转入正文，讲三个问题，或者说，简略地提下面三个问题并讲一点我的看法。

哲学基本问题和唯物史观

我所见到的现在流行的哲学教科书，在讲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时，讲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时，一般是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别开来说的，各有各的标准。如说：意识和存在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是划分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的标准；社会意识和 社会 存在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是划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这样分别说明在形式上逻辑上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细细想来，这种分别说明对于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总不免有不小的缺点，因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来，决不能把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割裂开来。列宁说：“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看不到这个原理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本来应当如此，不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然而上引的话中所说的“唯物主义哲学”，在严格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只是指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

有人说，这是由于体例关系，由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来叙述。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的做法是否合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看来，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能否只限于从自然观上讲一般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而不讲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对立？

这里也许还有历史上的原因。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提出哲学基本问题，讲思维对存在的关系，看来主要是指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而言。这是记录了实际上从中世纪经院哲学中已开始的近代哲学中争论的事实。

那时争论的问题是：世界是神创造的，还是本来就有的？恩格斯据此极一般地指出那时的哲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在思维和存在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上）分为两个阵营，唯物主义阵营和唯心主义阵营。如果我没有弄错，这里暂时撇开了社会历史领域的分歧。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说到在“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这个唯物主义一般原理时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一切旧唯物主义者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差别”，也是指哲学史上的这个事实而言，这里显然不涉及社会历史领域。

但是，唯物主义哲学到此是否就算完备了呢？无产阶级是否就以与十八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者、十九世纪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称兄道弟共居于“同一阵营”为满足呢？这样是否就算是彻底地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的问题了呢？显然不能这样看。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并没有停留在所有唯物主义者都可以接受的一般唯物主义原理上。不是别人，正是列宁（列宁有一个不幸处，就是他常常被有的人莫名其妙地打扮成仅仅是一个一般唯物主义者），而且不是在别的地方，恰恰是在被有的人误认为只是阐述一般唯物主义原理而不是更高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中，特别着重地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特别注意的是使唯物主义哲学向上发展，也就是说，他们所特别注意的是唯物主义认识论，而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列宁在另一个地方还明确地指出：“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在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上，而是把哲学向前推进了”。

把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哲学向那里推进？主要是向历史领域推进。我们看，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一书中，在说明哲学基本问题之后，马上就进一步指出：只是从对历史也应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的时候起，才为唯物主义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实际上就是向我们指出，要真正科学地解决思维对存在的

关系问题（包括第一方面的问题），必须超越自然观范畴，而进入历史观范畴。必须使旧唯物主义转变为新唯物主义。恩格斯在上书的另一处谈到现实世界时，特别用括弧注明，所谓现实世界包括自然界和历史。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新的历史观是科学地解决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的直接的理论前提。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指出这一点，他说：“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重点号是引者加的）旧唯物主义者能不能作出这种“科学的规定”呢？当然不可能。就拿杰出的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来说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评论费尔巴哈的时候，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在他在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隔离的。”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叫做新唯物主义。其“新”主要就表现在使唯物主义成为辩证的唯物主义，并对历史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自然观和历史观统一成为一个整体。毫无疑义，对历史作唯物主义的解释，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最大特点，或者象恩格斯所说，唯物史观是他（和马克思）所主张的新世界观的核心。

由上述可知，要真正科学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的问题，不能撇开“使唯物主义哲学向上发展”的问题。要真正搞清楚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也必须搞清楚什么是旧唯物主义、什么是新唯物主义。停留于自然观范畴，不可能和唯心主义彻底划清界限。分不清什么是旧唯物主义、什么是新唯物主义，也不可能真正弄清楚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这是哲学史上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一个不应忽视更不能否认的重要事实。

历史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

怎样使唯物主义哲学向上发展？怎样把唯物主义应用于历史？这里主要是依靠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主要借助于辩证法推进唯物主义，克服旧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从而发现了新的历史观，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完成了历史上的殊勋，使十八世纪成为法国人的世纪。我们不反对把这种唯物主义哲学的进步的历史作用歌颂千百遍，并且号召现在的和将来的人们学习他们对于唯心主义神学、宗教迷信的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他们已经把唯物主义哲学推到了顶峰，不能认为他们的哲学认识论（在使主观和客观达到一致方面）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识论毫无区别，因此我们除了崇敬、歌颂、膜拜之外，已别无其他事情可做了。他们中有的人（例如狄德罗）有时也能写出辩证法的杰作（恩格斯解释说，这是“在本来意义的哲学之外”的东西）。但整个说来，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几乎全部为机械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所支配，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也许还要加上他们的阶级地位的影响）使他们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同时，也使他们虽然物质观深深地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泥潭。

列宁在说到马克思把旧唯物主义哲学推向前进的时候，在说到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避难所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的时候，特别指出，这是由于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成果，特别是使用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能产生的黑格尔体系的成果丰富了哲学，这些成果中最重要的就是辩证法。”对于社会历史持辩证法观点，固然不等于就达到了历史唯物论，但是，要达到历史唯物论，必须借助于辩证法。从西欧历史上看，在社会历史问题上，人及其思想、感觉和周围社会环境的关系这个问题早已提出来了。法国唯物主义者没有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说，环境是人们的“意见”所创造的，这样就回到被他们严厉斥责的唯心主义观点上去了。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进了一步，他们提出了“政治结

构的根源在社会关系中，而社会关系是由所有权决定的”这样极重要的论断，但是他们同样在所有权取决于什么这个问题面前止步不前，终于堕入了关于人的天性的空论中去。德国唯心主义者把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归结为绝对理念，但是他们提供了伟大的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借助于这个辩证法（经过改造）发现了人和环境、政治和经济、自由和必然等的相互作用，并利用自然科学的成就，自然辩证法的发现，总结当时社会运动的经验，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这样才发现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达到用社会存在来说明社会意识的科学结论，从而确立了唯物主义在历史观领域内的王位。以为离开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胜利战斗，旧唯物主义能够自动上升到历史领域去，这纯粹是空想。

恩格斯说：科学社会主义“只能产生于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产生于德国。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注意：恩格斯在这里用了“只能”、“只有”这样的字眼，高度评价了辩证法在新历史观产生中的作用。他特别指明辩证法和阶级斗争、革命的关系。革命的历史辩证法的对立物是庸俗进化论，后者认为无论自然界或历史都没有飞跃，世界上一切变化只是在量变形态上逐渐进行的。这种“进化论”敌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敌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认为不必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就会自动降临。无产阶级的革命历史辩证法的观点，在阶级社会中，在存在着阶级斗争的国际社会中，在社会革命的问题上，在夺取社会主义胜利的问题上，毫无疑问，就是阶级斗争的观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我们不要忘记，甚至连某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也懂得：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

发现历史唯物论，要借助于辩证法；推进历史唯物论，也要依靠辩证法。大家承认，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历史唯物论作了重要的贡献。这种贡献从何而来呢？主要地是由于运用辩证法来分析社会主义的矛盾，并批判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已不存在矛盾的

形而上学观点所得出的结果。

我们说的运用辩证法，自然不是说把外在于历史的辩证法规律人为地注入历史，而是把历史本身内在的固有的辩证法阐发出来，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即我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恩格斯自己这样认为：马克思和他，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见《反杜林论》三版序言）。在自然领域，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然辩证法阐发出来，从而使唯物主义自然观达到完备，它既超越了黑格尔形式的旧的自然哲学（它只承认空间的多样性，而不承认自然界有任何时间上的发展）也超越了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自然观。在历史领域，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历史辩证法并把它转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更是人类有史以来科学的一个伟大发现，它为一切想成为科学的社会学说提供了必要的序言。这里，不仅就两者的相互作用而言，而且就其达到的结果来说，辩证法和唯物论都是密不可分的，历史辩证法也就是历史唯物论，正像自然辩证法也就是自然唯物论一样，反之亦然。

从旧唯物主义转变为新唯物主义即现代唯物主义，依靠两个东西，或称两大基石，即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把唯物主义推向历史领域，是依靠辩证法的大力神；同样，辩证法对于自然科学来说也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的发生发展过程和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把自觉的辩证法“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我们说历史辩证法也就是历史唯物论，和恩格斯所说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的。

当然，我们说历史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是一个概念、一个东西，不是说两者绝对等同。列宁在评论《资本论》时说过：辩证法、唯物主义认识论、逻辑是同一个东西，不必要三个词。我想，只要头脑不被形而上学毒害的人，都会懂得，列宁在这里是在一定意义上说的，并不是说三者没有差别，因此可以任意互相取代或互相否定。毛泽东同志也说过：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是一个东西。我们说历史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是一个概念，不是

两个概念，也是在同样意义上说的。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来，这是常识，本值不得大惊小怪。

历史观领域的两条战线斗争

在哲学上，或单就历史观领域来说，所谓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就是说，既要反对唯心主义，又要反对形而上学、机械论。因此把它叫做反对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也可以。有人却不以为然，认为在哲学上，特别在历史观领域内，只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即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而没有两条战线的斗争

（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反对唯心主义又反对形而上学的斗争），认为提两条战线斗争就是企图“超越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或“超越于历史唯物论和历史唯心论之上”。这个罪名确实是大得吓人。尽管我们所说的两条战线斗争明明包含着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它并没有宽容唯心主义或向唯心主义让步。在这些同志看来，哲学上特别在历史观领域内，古今中外，根本没有“两条战线斗争”这回事，所谓两条战线斗争完全是头脑有“特异功能”的人创造发明出来的怪物。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在地方阐述过我的看法了，这里单就有关历史观的问题再说几句。

请允许我首先提一个问题：在历史观领域，卓越的骁勇善战的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和十九世纪的杰出的费尔巴哈，有过反对唯心主义的战斗业绩吗？无论是被认为具有某种辩证法见解的狄德罗也好，或者是把人作为哲学的至上出发点的费尔巴哈也好，他们有在历史领域内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能力吗？他们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岂不是恰恰和唯心主义处于亲密无间的“同一阵营”中吗？他们的形象整体不正是拿唯物主义（下半截）和唯心主义（上半截）极不和谐地拼凑起来的吗？

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回答问题，将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在历史观领域，还是自然观领域，旧唯物主义者概不懂得两条战线的斗争，也不允许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他们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确实是骁勇善战的，但是如果仔细考

察他们的战斗，就会发现：他们一个个都是跛脚的勇士，因为只要他们一接触历史领域，他们就会顿时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并滚入唯心主义泥潭，使两条路线斗争化为乌有。

我在上面说过，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同唯心主义滚在一起，主要原因就在于，这种唯物主义是“纯形而上学、完全机械的”。恩格斯和列宁毫不含糊地指出，要把这种唯物主义推向前进，要使它上升到历史领域去，决定性的，是要运用辩证法来克服其形而上学性、机械性。离开辩证法，这种唯物主义决不可能能够自动上升到历史领域去。因此，从这个历史事实来看，我们说，两条战线斗争的概念并不是不适用于历史领域，恰恰相反，它特别适用于历史领域，——这样说难道不是更唯物主义一些吗？

那末，在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确立之后，情况又怎样呢？这时，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否就消失了呢？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例如欧洲 1848 年革命后，以及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在历史领域内，资产阶级哲学一次又一次地用机械论向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进攻，用庸俗进化论来反对社会革命论，并力图恢复十八世纪的机械唯物论形式；在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中间，也有人把历史唯物论庸俗化、形而上学化。恩格斯在他逝世前不久曾驳斥这种做法，指出这种把历史唯物论庸俗化、形而上学化的主要表现就是在经济运动和上层建筑运动的因果关系上忽略其相互作用，“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做永恒对立的两极”。（恩格斯 1893 年 7 月 14 日致梅林信）这种观点认为“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恩格斯 1894 年 1 月 25 日致瓦·博尔吉乌斯信）恩格斯责备某些唯物主义者忘记了马克思所说的“本身为环境所造成的人又是怎样去改变环境的”，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曲解为在历史上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的所谓“经济唯物论”。普列汉诺夫在他所写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中重复了恩格斯的这些话，并加以说明。为什么“某些人”会发生这种庸俗化现象呢？对此，恩

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看来，认为历史领域只有唯心唯物之争而无辩证法形而上学之争的同志们，对于这种情况是漠视的，他们未曾想到以机械论观点（即恩格斯所谓“刻板地、非辩证”的观点）来对待历史唯物论因而使历史唯物论呈现歪曲形态的人确是有的。这种人除了恩格斯指出的缺乏辩证法的先生们之外，稍后，还有俄国的波格丹诺夫、舒里雅齐柯夫、苏汉诺夫一类。列宁指出，波格丹诺夫的“上半截”就是被庸俗化了的历史唯物论；舒里雅齐柯夫则把哲学上的一切术语、公式都说成是标明社会上各个阶级、集团等等的相互关系，甚至认为无产阶级=物质，更是肆无忌惮地把历史唯物论庸俗化到了极点。至于苏汉诺夫的观点见列宁的《论我国革命》一文，是大家熟悉的，这里不提了。

可以不可以说，把历史唯物论庸俗化、形而上学化的现象，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以后就不再发生了呢？事实也不是这样。这类现象或倾向一直伴随着我们，有时消隐，有时浮现。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实，也毫不例外。中国的经济比革命时的俄国更加落后，怎样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已经出现的社会主义社会？围绕着这个问题人们的争论很长时期以来未曾平息过。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能也没有必要详细回顾这些争论。但有一种论调必须指出，这就是在公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前后，当我们批评到那种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化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因而否认我们的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不适当的论点时，有的同志正像列宁所说的用各种腔调一再重复：“只有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说：完全正确！绝对没有根据认为这种论点是庸俗经济唯物论。这是无可争辩的，这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在我们中国，在某几个时期，包括最近一个时期，在社会变革问题上，有没有出现过一种可以而且应该叫做庸俗经济唯物论或近似庸俗经济唯物论的倾向呢？我说，还是有的，虽然有的是在正常讨论中不可避免地发生的。这种倾向，就是不正确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承认在历史上“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并且抽象地教条式地对待为

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实际上对经济不大发达的国家首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点表示怀疑或异议，因此，认为我党在五十年代（尽管那时我国已经有强大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和相当的社会化生产力）领导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脱离我国生产力水平的左倾冒险，是十足的主观主义，等等。我们固然必须彻底清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漠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种种左倾冒险行动，我们赞赏理论界一些同志在这方面所表现的勇气；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因此出现另一种极端，那就是否认在我国现有生产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决议》关于这一点已经作出明确的结论。我们在这方面大家坦率地保持一致。一方面光明磊落地正视客观存在过的倾向，同时实事求是地总结思维上的经验教训。

同时应当承认，这种倾向之所以产生，诚如恩格斯所说，其重要原因，在于在经济运动和上层建筑运动的因果关系上忽视其相互作用，“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做永恒对立的两极”。这也就是告诉我们：在历史观领域内，我们千万不能有那怕是一丝一毫厌弃辩证法的情绪。十年内乱唯心主义盛行，但不能把这归咎于辩证法。相反，不少唯心主义东西是由于违反辩证法，由形而上学绝对化导致的（例如，所谓“上层建筑决定论”之类）。我们如何对待历史经验，是片面地总结历史经验，还是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要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就要运用辩证法，以避免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例如，从批判历史唯心论而跳向庸俗经济唯物论，从批判“政治决定论”而跳向经济自发论等等。辩证法要求的是客观性和全面性。而要保证全面性，就不能拒绝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根据以上种种事实，我想，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确凿无疑地说：在历史观领域内，正像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不会陈腐一样，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也是不会陈腐的。这里，只要是真正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不会拒绝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的。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是

怎样教导我们学哲学的？

温济泽

有些同志要我讲讲——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是怎样教导我们学哲学的。这个题目，我讲不好。我在延安，做过哲学的教学工作，也做过研究工作，时间都不长。我所知道的情况也不全面。今天我讲的，只能是一些片断的回忆。

我是一九三八年二月到延安的。到延安以前，自学过哲学，对哲学有点兴趣。到延安以后不久，见到了艾思奇同志。我们谈过一些哲学问题。那时候，他在抗大教哲学。抗大的前身是红大，就是红军大学。红大的哲学课，是毛泽东同志讲授的。毛泽东同志写过一本《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共分三章。第一章的题目是：《唯心论与唯物论》。这一章讲了四个问题：哲学中的两军对战；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区别；唯心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唯物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第二章的题目是：《辩证法唯物论》。这一章讲了十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辩证法唯物论；过去哲学遗产同辩证法唯物论的关系；在辩证法唯物论中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哲学对象问题；物质论；运动论（发展论）；时空论；意识论；反映论；真理论；实践论。第三章的题目是：《唯物辩证法》。这一章讲了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矛盾统一法则；质量互变法则；否定之否定法则；还讲了同这些根本法

则联系着的各个范畴：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原因与结果；根据与条件；可能与现实；偶然与必然；必然与自由；链与环；等等。听说毛泽东同志在讲课以前，先把提纲发给学员看，让大家提问题，然后再讲解。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的《实践论》就是第二章中的一节，《矛盾论》就是在第三章《矛盾统一法则》